



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2. 普及初等教育



3. 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



4. 降低儿童死亡率



6. 与HIV/AIDS、疟疾和其他疾病做斗争



5. 改善孕产妇保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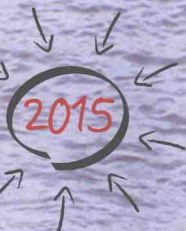
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8. 建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信守承诺

千年发展目标



ISBN 7-5005-8627-2



9 787500 586272 >

ISBN 7-5005-8627-2

D·0254 定价: 12.00元



UN
CHRONICLE

联合国纪事

联合国在一个联合的世界上
2005年6—8月 第2期 第42卷

把握机会 的峰会



本期内容……2005 年世界峰会

4 千年发展目标

4 来自秘书长

“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

5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实践计划

杰弗里·D. 萨克斯

7 柬埔寨的减贫行动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制订政策进程中的作用

米奇·罗森

9 增进全球健康战略

将健康教育和行动结合起来

艾利克斯·奥迪耶诺



10 观点

赋权于妇女：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10 年回顾

美兰妮·贝卡·马尔加·杜罗-莫利斯

12 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新决议

维克拉姆·苏拉

14 安全母亲行动

事关人权和社会公正

雷塔·鲁斯拉

17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报告

结核病与艾滋病病毒相关情况在非洲已

达警戒线水平

恩里卡·莱因哈特

20 使人人共享水资源

为人人享有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而努力

阿尔伯特·J. 舒马彻

2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环境的可持续性

确保饮用水的安全和卫生设施的提供

艾罗尔·格莱姆斯

26 为非洲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制订框架

克利斯蒂娜·奥克塞尔

29 打造新的伙伴关系

千年运动关注媒体

莉萨·克鲁奇

30 民主与市场经济

透明度、责任和参与是公平的关键

茱丽安娜·瑞贝罗

32 《联合国纪事》专访

马里的乌斯马纳·西对《联合国纪事》谈分权

在建设民主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40 跨页插图

千年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

信守承诺

35 对抗自然灾害

35 澳大利亚对海啸的应急反应

艾伦·马奇

37 第一人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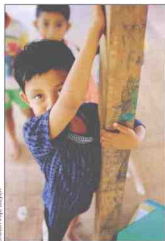
噩梦远去，寄望未来

迈克尔·弗莱姆

42 图片文章

瞩目海啸过后

安杰·拜廷



发展和平文化

48 赢得和平

通过发展与安全加强和平建设

伊万·尼迈克

51 真正的和平建设者

合作在防止武装冲突中的重要性

小范迪·坎亚库

53 观点

和平就在我们手中

约瑟夫·德里韦拉

56 赞美人类精神

艺术家反对使用地雷

拉斯娜·瓦拉

58 学会宽容

点燃心头宽容的火焰：媒体的作用

维克拉姆·苏拉

60 世界应当更多知道的 10 个问题

60 随笔

爱因斯坦的奇迹

汉斯·克里斯蒂安·冯·巴耶

70 访谈录

巴拿马第一夫人维维安·

费尔南德斯·德托里霍斯向《联合国纪事》谈在

巴拿马提高妇女和残疾人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

72 使命宣言

万国邮政联盟：合作与发展的全球性论坛

爱德华·达扬



UNEP/Photo Library



75 气候变化

投资人峰会评估风险与商机

阿米尔·A. 多塞和明迪·S. 吕贝尔

78 食品大军

联合国关于饥荒问题的视频游戏获得惊人反响

霍斯特·鲁奇




联合国纪事

如同汉斯·克里斯蒂安·冯·巴耶博士在本刊第66页所说的那样，2005年是被称之为“奇迹年”的百年庆典的一年。当我们满怀期待迎接2005年世界峰会之际，至少我们感到2005年有可能，仅仅是可能享有“奇迹年”这一荣耀。《联合国宪章》不应仅被视为一份定义社会的文件，它也应该记录成就（战争的结束）和决心（不允许战争再度出现）的文件。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其前提仍在，但却体现在联合国所秉承的宗旨和原则中（而这些宗旨和原则，曾被我们认为是其对现实和要实现目标的宣言），今天是一个机会，一个对联合国进行改革的机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题为“更大的自由”（见《联合国纪事》2005年第1期）的报告中提出了世界峰会议程，为通过一个多边的民主体制框架，将发展、安全和人权联系在一起并采取集体行动概括出意义深远的议案（第4页）。该报告是根据两项范围广泛的对全球挑战的审议而撰写的。这两项审议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联合国纪事》2004年第4期）和《为发展投资》，它们是根据安南要求而进行的。后一项报告是由以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为首，由256位发展问题专家组成的独立咨询机构做出的联合国千年项目最终报告。关于此事，萨克斯教授写道，该报告为我们采取集体行动，以使峰会能够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所需的政策突破提供了详细的蓝图”（第5页）。

在减少贫困和饥饿方面，市民社会应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该有发言权”（第7页）。普及教育的作用也同样重要，特别是那些与健康（第9页）、赋予妇女权力（第10页）、改善孕产妇健康（第14页）和抗击诸如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相关的教育（第17页）更是如此。通过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性，特别是保证那些生活在非洲城市贫民区中的居民（第26页）人人可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第20页）和卫生设施（第23页）给人们的健康带来的好处，是能够加以衡量的。

为发展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第29页）。同样，建立公平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也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第30页）。诸如气候变化（第75页）等全球性主要威胁使这一问题更加具有必要性。天灾过后人们更加认识到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紧迫性。本期登载了三位作者对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报道。艾兰·马奇的文章描述了澳大利亚在灾难降落后在邻国受灾地区做出的紧急反应（第35页），迈克尔·弗莱姆则描述了一个斯里兰卡家庭遭受灾难的痛苦故事（第37页），而安杰·拜延令人战栗的图片文章（第42页）使人们看到联合国领导下对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展开的国际救灾行动的第一手资料。

面对全世界对灾难做出的反应，我们不禁要问：当灾难来临时，我们的反应为何能够如此迅速，如此有效，如此具有人道主义。但我们对那些来得不如此猛烈、不如此迫在眉睫、而造成的后果却同样严重，同样使人绝望并侵犯人权的灾难为何却表现得如此矛盾，而且似乎准备被动地接受这些灾难？这也反映出世界峰会所面临的机会，用安南秘书长的话说，“务实的开始可以使世界前进的方向发生改变。”



“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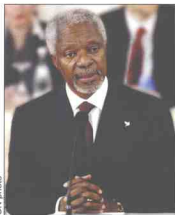
5年前，联合国大会要求我对《千年宣言》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审议，并决定今年9月在纽约再次举行峰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坦率地讲，我本人不认为仅凭一个审议就能处理当前的世界形势。我本人强烈地认为，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的10年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机遇，并将上百万的人民从死亡和灾难中拯救出来，我们目前急需在发展、安全和人权等方面做出决策，急需对联合国的结构进行改革。

比如说，如果各国政府决定采纳我在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我本人相信我们将有机会更好地对抗艾滋病毒和疟疾；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来遏制新型传染病的蔓延，不论这些传染病是人为制造的还是天灾；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来防止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发动的袭击；将有更好的机会来防止海地、阿富汗和塞拉利昂等国重新陷入混乱和危机的深渊；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在如何对付诸如萨达姆这样桀骜不驯的政权方面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得到加强的安理会和新成立的具有权威性的人权委员会这两个同地区性组织密切合作的机构，使联合国能够更加有效地采取行动，制止诸如在达尔富尔正在发生的那种对无辜人民的重大犯罪。

本报告（《更大的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是我本人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制订的行动纲领，目的是为了确保那些抗击贫困的承诺能够得到履行并取得实质性成果，确保因伊拉克战争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创伤能够愈合，确保作为全世界为人权而奋斗的领导的联合国的威信能够得到重建。我现在发表这一报告，是为了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6个月的时间对这一报告的内容进行考虑，同自己的人民进行讨论。我希望他们做好准备，以便在9月份能够来纽约做出必要的决策。

……

我本人为最近的进展（关于将发展援助增加到占国民总收入0.7%的呼吁）所鼓舞。在欧洲，有5个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许多其他的捐助国也实现了这一目标制订了时间表。……现在，我们真正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UN PHOTO

但仅增加发展援助是不够的。发展援助的前期投入应该更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当然，每个国家能够提供多少发展援助，得由那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自己决定，但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和了解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问题的人，我还要继续鼓励并敦促那些有能力给予的国家慷慨地施舍。我认为，世界上许多人民是愿意提供帮助的。在整个海啸危机发生期间他们已经表现出这种精神，而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

我认为报告中的论点已经十分清楚：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共同面对许多挑战和威胁，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无法单独面对这些威胁，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制止这些威胁，不论是恐怖主义，还是核不扩散问题，抑或是导致国家走向失败的环境恶化和贫困问题。我们还清楚，无视那些失败的国家会产生新的问题，有时会使我们自己也深受其害。……我们大家所进行的集体努力实际上符合每个成员国的国家利益。

……

在民主和人权的发展方面，我们确实有帮助那些试图强化自己国家的制度、改善自己国家的民主、对人权结构进行改革的政府提供帮助的使命。我们还应一些政府的请求，对一些国家的选举进行监督。

……

拟议中的改革需要资源。我已经指出，许多已经做出的承诺尚没有兑现。但我感觉到一种新的精神——比如在经济领域以及一些政府表示出的参与并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增加它们的发展援助，目前正在权衡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实质性资源。一些国家正在寻找富有创意的资助渠道。……现在有一种新的气氛，如果我们同这些国家一起努力工作，我们就有可能同它们一起实现那些做出的承诺。□

节选自安南秘书长于2005年3月21日发表他的报告《更大的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时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实践计划

杰弗里·D. 萨克斯

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的10年中将世界的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这样，数以10亿的人就能够分享全球的经济成果，上千万人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拯救。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存在的。现在，政治框架已建立，而且我们也第一次完全能够支付得起这一代价。不论一个人抗拒极端贫困的动机是什么——是人权、宗教价值观、安全、财政方面的考虑，还是思想意识——解决的办法都是相同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联合国千年项目是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授权成立的一个独立的顾问机构，其宗旨是为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制订一项全球计划。如果世界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超过5亿的人就能够摆脱贫困，2.5亿人就能够从此不再忍受饥饿，3000万儿童和200万母亲极有可能遭遇不测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拯救。

2005年1月，联合国千年项目向安南秘书长递交了他们完成的报告《为发展投资：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实践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265名世界一流的发展问题专家组成的杰出团队的工作成果制订的，他们为推动抗击全球性贫困、饥饿和疾病而制订了一套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战略。这一报告的发表是2005年一系列有关千年发展目标全球行动的第一步，这些行动计划将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峰会上汇总，它们为制订一项突破性的全球政策，以帮助那些最贫穷国家实现这些目标而展现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报告还为促使这一状况的出现向人们提供了详细的蓝图。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报告的建议部分中还列出一些具体行动者在未来几个月中所应该采取的关键步骤及在未来10年中应该谨慎遵循的步骤。发展中国家应该大胆通过那些在2015年之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战略。为了保证能够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建议所有国家都应该在2006年之前制订出自己的战略，那些已经制订了“减贫战略文件”的国家，其“减贫战略文件”应该与千年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减贫战略应该锁定公共投资、能力建造、国内资源动员和官方发展援助这些问题。这些战略还应当提供一个强化治理结构、促进人权、促进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参与的框架。这些战略应该以对在2015年之前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投资和政策的评估为基础。这些战略应该能够阐述在未来3—5年国家投资、政策和预算的详细情况。这些投资必须以乡村和城市生产力，教育，性别平等，饮水及卫生设施，环境的可持续性，科学和技术，以及妇女和女童健康、包括生殖健康为关注点的创新和政策，以及教育成果、政治和经济方面机会的获得，财产控制权及免遭暴力对待的自由为中心。

为了使这些战略发挥效力，国家应该做到：促进透明和分权化的治理机制；包括相应增加诸如培训和留住熟练技术工人的可操作性的战略；促进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决策和提供服务；提供进行监督和评估的资源；制订私营部门促进战略和为穷人制定增加收入的战略；并根据那些内陆国家、发展中的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最脆弱的国家的特殊需要，对这些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使其更适合需要。

这些战略应该能够考虑到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方面的影响，包括到2015年将国内动员的资源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4个百分点，计算出所需要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对结束援助依赖状况的“撤出战略”进行阐述，这种撤出战略应该适合一个国家的形势。这些战略在制订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包容性的过程，应该与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及国际伙伴密切合作。民间社会组织应该主动为政策制订、服务提供和监督程序建言献策。与此同时，私营公司和组织也应该主动为政策的设计、发动透明运动，在情况允许时还应为发展公私伙伴关系而建言献策。国际捐助者应该在2005年之内确定至少十几个走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快速路”上的国家，以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并认识到，许多国家已经具有良好的治理结构和接受援助的基础，具备了接受相应增加的官方发展援助的能力。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努力，采取一系列“快速至胜”的行动，以拯救上百万人的生命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还应该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努力，在社区层面上培养专业能力。这些快速至胜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仅局限下列范围：

✓ 在2007年底之前对疟疾肆虐地区的儿童大规模免费发放蚊帐和有效的抗疟疾药品。

✓ 在2006年年底之前免去小学学费及一些基础卫生保健服务的收费，如有必要，因免去收费所出现的差额缺口由增加的援助来填补。

✓ 在2005年年底之前成功完成为300万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的3X5战役。

✓ 在2006年年底之前利用当地生产的食物，扩大所有饥荒高发地区学校的午餐发放计划，以覆盖所有儿童。

✓ 在2006年年底之前，以免费或以补贴形式向小农场主缺乏养分的土地发放化肥和农林复合肥料，以增加土壤的养分。

以社区为基础对劳动者提供群众性的培训计划，以确保到2015年每个地方社区都拥有卫生、教育、农业、营养、基础结构、供水和卫生设施、环境管理和公共部门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并且，还应在促进两性平等和参与方面提供适当的培训。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使国家战略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等地区性倡议保持一致。地区性开发集团应该得到捐助者增加的直接援助，特别是对执行跨国项目的援助。这些集团在确定、计划和执行诸如公路、铁路和河流等跨越国界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应该得到更多的帮助。这些集团应该引入并执行监督审查机制，以促进采用最佳实践和良好的治理结构。

那些高收入国家应该将官方发展援助在2003年占捐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25%的基础上，到2006年增加到0.44%，到2015年增加到0.54%，以帮助那些低收入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同时，援助的质量应该提高，援助的方式应当更加协调和可以预期，更多地采取以赠款为基础的预算支持方式进行。每个捐助者应当最迟在2015年之前将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以对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优先的发展援助领域提供支持。减债行动的范围应更加广泛，更加慷慨。重要的是，官方发展援助应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实际需要和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地使用这种援助、并乐于接受为基础。评估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标准必须与这些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保持一致。援助的提供必须与对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减贫战略提供帮助为导向，而不是那些捐助国感兴趣的项目。捐助国应该对其与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投资的增长份额做出估算和报告。

中等收入国家也应该寻找机会使自己成为官方发展援助的提供者，并对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些高收入国家应该通过多哈贸易回合，向那些低收入国家的出口产品开放自己的市场，并通过与贸易有关的包括电力、公路和港口等关键性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方式来向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多哈发展议程应当得以贯彻执行，最迟应在2006年之前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国际捐

助者应该动员力量对那些为解决穷人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开发项目提供支持。这些研究和开发的领域包括医疗卫生、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能源和气候等。据我们估计，这方面的需求总额到2015年约为70亿美元。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联合国的开发机构应该在联合国总部和国家级水平上加强联合国各机构、各项基金及各个规划之间的协调，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支持。联合国派到各国的各种团队也应该得到加强，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及地区性开发银行密切合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支持并改善国家级技术咨询的质量。这些派驻各国的团队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培训，人员应该充实，并得到足够的资助。这样，它们才能够为那些项目国家实现预定目标提供帮助。

为了保证这些行动获得成功，世界应该在2005年开始能力建设，改进政策，使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投资到位。而且，这些努力必须在今后的10年中在全球、国家和地区级的层次上保持下去。我们只有现在就采取行动，才有可能应对环境向人类所发起的如气候变化和渔业资源枯竭等长期性挑战。否则，这些环境威胁将给贫穷国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仅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进行自我保护的。

如果我们有雄心要在未来的10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那么现在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发展中国家应该紧紧围绕着要实现的目标动员起来，尽一切努力，富国也应该扪心自问，是像现在在一些国家那样，在责任问题上对穷国指手画脚，还是应静下心来履行自己做出的承诺。国际社会也应该不顾一切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在千年发展目标变得遥不可及或实现无望之前，更大规模、更快地采取实际步骤去实现这些目标。如果我们今天不投资，那我们距3000年下一次千年峰会召开之时，减贫之路还将是漫漫无际。□



杰弗里·D. 萨克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所主任、卫生保健政策和管理学教授、联合国千年项目主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千年发展目标问题特别顾问。萨克斯先生以在经济改革方面向众多国家的政府提供咨询及其在促进减贫、疾病控制和贫穷国家减债等方面的著作而蜚声国际。美国《时代》杂志将他评为世界一百名最具影响力

的领袖人物。此外，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文章和众多著作。

柬埔寨的 减贫行动

信守承诺
千年发展目标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 在政策制订进程中的作用

米奇·罗森

1975年4月17日，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控制了柬埔寨后，这个国家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红色高棉政权将柬埔寨的国名改为民主柬埔寨，对柬埔寨人民的生活实行了严厉的限制，开始了为期4年的清洗运动，清除国内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的目标是在柬埔寨建立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

结果，柬埔寨全国20%的人口遭到屠杀。红色高棉使用酷刑和处决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维斯隆和镇艾斯万人冢是当时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死亡营，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国家被推向崩溃。1979年1月7日，随着越南军队的入侵，红色高棉政权终于垮台。将红色高棉的当权者送上审判台，一直是联合国追求的目标。尽管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普兰·普伦德加斯特（最近已退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仍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在“日本、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法庭已经建立，刽子手最终会在这里受到审判。”

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先要实现的任务。在柬埔寨王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柬埔寨在抗击贫困和社会重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数以百计的其他组织对柬埔寨在减贫并建立可持续发展方面所提供的新的支持，不仅使柬埔寨人民拥有了与贫困进行斗争的武器，同时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999年，减贫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努力的核心内容，这一努力导致减贫战略文件（PRSP）的问世。这一新的减贫尝试要求那些寻求优惠性贷款的国家必须制订自己的减贫计划。这一文件对减贫行动应该采取的特别步骤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对贫穷的原因进行诊断；减贫的目标、指标和监督系统；三年间首先要采取的公共减贫行动。

减贫战略文件在柬埔寨被看成是国家减贫战略，这一战略在2002年获得通过并在2003年开始执行。被柬埔寨政府纳入国家减贫战略的领域包括：农业和农村发展；儿童权



© Maiti Roum photo

益；政府分权；残疾及康复；裁军及复员；教育；选举改革；渔业及林业部门；性别及妇女参与；治理结构和透明度；健康与艾滋病；地雷和未爆炸武器对社区的影响；土地改革；小额贷款；受战争影响人民的重新安置及他们的权利；老年人权益及关怀；法制；小型武器的减少和管理以及贸易政策。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柬埔寨都从事多领域的活动，并在为这些领域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订减贫计划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对于贫困，人们使用着许多定义，这些定义根据不同机构或国家的需要在随时变化。减贫战略文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要求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参加政策的制订，并在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让这些组织参与国家减贫战略计划的制订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这样做可以使减贫目标更有可能实现。这些组织通常规模很小，而且在遥远偏僻的乡村开展工作，缺少成为更大组织一部分所要求的必备技术条件，但政府承认，这些地方性组织在自己的社区掌握着与贫困相关问题的第一手知识、拥有推行减贫政策所需要的各种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由于制订减贫战略文件的要求只是在最近5年才被提出，人们还缺少有关这一战略文件总体上取得成功的信息，这种情况使得文件制订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不论一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何种语言，大多数减贫战略文件都使用英语，但这样有可能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人员感到难以读

懂。所以,为那些努力制订出好政策的人们提供当地语言文本的工作也十分重要。有几个国家,如阿尔巴尼亚、加纳、几内亚、卢旺达和也门等已经率先提供文件的当地语言翻译文本。柬埔寨虽然在制订国家减贫战略文件过程中并没有提供高棉语的翻译文本,但在那些外国组织的努力下,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还是参加了减贫战略计划的制订过程。不过,这些组织仍然关注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的议程。比如说,那些外省组织就很难参加计划在金边召开的会议。对小型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来讲,要参加会议不仅路程遥远,费用也是一个问题。只提供交通费让他们前来参加政策制订会议使他们感到为难。

那些参与制订减贫政策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决策一方和咨询方之间发生的矛盾。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角度看,参加者应参与谈判,并与那些决策者及社区成员分享信息,但另一方面,决策者们仅将做出的决定通知作为咨询者参加政策制订过程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这些组织参与这些政策的制订,但却没有对真正参与的内容给予具体的指导。尽管有几个规模较大的非政府组织承认,他们的一些提议被纳入最后文件,但柬埔寨许多组织认为,政府对他们的作用更加倾向于咨询。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成立时间的长短,是导致人们认为柬埔寨减贫战略文件的制订过程是咨询过程的原因之一。许多已经成立的组织认为这一过程参与性较少,还因为那些成立较早的组织在此之前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减贫计划,因而不愿意去适应新政策的要求。国家减贫战略所要解决的部门性问题得到了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论坛、柬埔寨合作委员会(CCC)等综合性组织的支持。这两个组织各拥有大约75个组织,由地方、国家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及民间社会组织组成。这类联合组织的成立加强了柬埔寨国家23个省之间正在运作的各种计划之间的沟通联系。

以金边为总部的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论坛在2004—2005年之间展开的行动只围绕着一个目标: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得到政府、捐助者政策和捐助行动以及社会各界的承认与支持。这一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其所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发展、环境、土地和生活状况及其他与加强柬埔寨人民能力有关的不同问题上。柬埔寨民间组织论坛是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论坛的成员之一,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微观层面上改善国家的森林和环境状况。在柬埔寨1330万人口中,80%的人生活在乡村,他们直接依靠自

然资源而生活。民间组织论坛一直努力通过教育、培训和志愿者计划在市民社会层次上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认识。

佛教和环境项目是柬埔寨磅士卑省和磅同省的几百名和尚创立的工作网。这一项目以佛教对环境的深邃伦理为根据,推动人们对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这一简洁独特的项目对当地的和尚们进行种子孕育、植树、水资源和新柴林管理方面的培训。然后由这些经过培训的和尚再为当地社区提供有关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重要性的教育。

尼木(Nyemo)是柬埔寨合作委员会非政府组织成员组织之一,该组织致力于国家减贫战略文件性别平等和妇女参政方面的目标,其使命是为那些处于弱势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她们的尊严得以恢复,并积极参加柬埔寨的经济发展活动。这一组织为那些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化的妇女提供教育和培训,以此作为向她们赋权的手段。尼木组织为那些妇女介绍提供援助的机会,为她们提供教育课程,并对她们进行文化和技能方面的培训、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儿童提供服务。目前,这一组织还在金边经营着一家名叫Le Rit's的餐馆,专门为参加这一计划的人们提供进一步发展职业技能的机会。该组织还以餐馆为依托,开设了一家商店和一个缝纫作坊。

相对来讲,人们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减贫战略文件提出的那些要求还比较陌生,这一新的减贫尝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目前尚没有人进行全面的评估。目前,柬埔寨正致力发展一种强大、可持续的经济以减少贫困现象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侵蚀。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纳入国家减贫战略的制订过程中来,为政府和服务提供者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人们对国家减贫战略能够取得成功充满了乐观的情绪。

那些目前正在制订减贫战略计划的国家应该注意使用文件翻译文本,召开能鼓励更多组织参加的会议,允许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全面参与政策制订过程,并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柬埔寨的国家减贫战略代表了这些组织和国际发展界、联合国各机构和柬埔寨政府为实现共同的减贫目标,像伙伴那样合作、乐于参与的态度和参与的能力。□



米奇·罗森, 教育出版业编辑, 曾游历整个东南亚地区, 并特别关注柬埔寨问题。米奇·罗森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服务管理学硕士及纽约大学教育文学硕士学位。本文是根据他本人2004年发表的论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对柬埔寨国家减贫战略制订的参与及影响》而写成的。



增进全球健康战略

将健康教育和健康行动结合起来

艾利克斯·奥迪耶诺

全球化、战争、恐怖主义、社会不稳定、疾病、贫穷和环境恶化等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健康领域，各国政府、医疗机构和个人正在采取行动来应对艾滋病的蔓延、非典及防范生物恐怖主义等世界大事。为了使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发挥最大的效益，在国家一级制订出一套清楚的全球健康能力建设战略是十分必要的。对那些从事公共健康事业的专业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计划如果不同时采取措施加强能力建设，这样的计划只能是空中楼阁。

将全球性健康培训的开发、检测和论证及采取的行动同理论、实践和政策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必要的。这一首创行动产生的效果，对于促进有关 21 世纪健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的教学和学习将发挥潜在的作用。尽管全球健康领域的范围很广，但那些从事这方面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必须认识到，应当将信息与通讯技术、倡导和社会资本（网络、标准、共同的目标）等的交互作用作为战略。

我们从联合国一些部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的活动可以体会到这种将培训和行动结合到一起的必要性。这些部门要实现它们的目标，就需要包括网络和倡导等在内的知识和技能。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教育为人人”和联合国识字 10 年活动已经把健康教育行动包括在作为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内，并将学校作为实现这些目标学术上的合作伙伴和提供服务的渠道，这些做法都反映了这种协同的关系。

情景认知¹需要将全球健康教育同概念——如人类安全——的定义和测试方法联系在一起。当健康的促进作用被看作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10 年活动（2005—2014 年）的重点范围时，使人权、安全甚至人的生命免遭普遍存在的威胁，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等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了。教育 10 年活动是根据联合国大会 2002 年通过的第 57/254 号决议而进行的。如能对这一 10 年活动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将是探索理论、实践和政策之间内在因素的一项值得进行的研究。

假设社会资本和信息通讯技术是学习和行动的主要资源，那么，教师则可以开发那些与可以获得的技术、过程、结果及现有战略有关的课程。反过来，这些课程可以同导向和旨在提高评估质量所实施的控制以及对执行过程的集成冲

击作用等新思维发生联系。在特定的条件下应对一个特定的健康问题时，这些进程和与其相关的行动应服从法律的规范。成功的范例、资金来源及资金的可获得性、网络、倡导及与其相关的方法和指标等反过来又可以形成这些概念。

如同玛丽·巴塞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看到、听到和经历的，通常是那种促使对改变公众的健康状况作出的充满激情的承诺，但倡导所需要的基础并不受我们的计算或所得出的统计数字的限制。”² 信息通讯技术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空间和地点的限制。这些技术能够强化学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感觉到同世界联系到一起，能够对那些原本远离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事物采取行动。这些技术还可以被用来作为加强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手段。³ 对此，莱斯利·杜亚尔的评论进一步反映出对倡导的需求。他指出，人们目前在用大约 10% 的医疗卫生资源在研究世界上 90% 的健康问题，他将这一现象称为“10/90 的鸿沟”⁴。

尽管还有更多范例可以被用来详细说明在全球健康教育和行动方面使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社会资本的必要性，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样，但对最佳实践、主要战略和将要出现的趋势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从逻辑上讲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Notes

1. Moore, Joyce L.; Lin, Xiaodong; Schwartz, Daniel L.; Petrosino, Anthony; Hickey, Daniel T.; Campbell, Olin; and Hmele, Cindy (199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tuated Cognition and Anchored Instruction: A Response to Tripp*.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ctober, 1994.
2. Bassett, M.T. (2003) *Public Health Advoc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August 2003; 93: 1204
3. Momen, Hooman (2004). The role of journals in enhancing health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82, No. 3, p. 163. See also Commission on Health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Health Research: Essential Link to Equity i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Doyal, Lesley (2004). Gender and the 10/90 gap in health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 82, No. 3, p. 162.



艾利克斯·奥迪耶诺，美国阿卡迪亚大学社会及人类学系国际和平冲突解决计划硕士生导师。



赋权于妇女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10年回顾

妇女地位委员会对其目标
和行动的审议

美兰妮·贝卡·马尔加·杜罗-莫利斯

联 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国际妇女节时指出：“如果要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我们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世界只有对妇女进行投资，我们才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

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是一项加强妇女地位的议程，也是世界妇女在21世纪向前奋进的里程碑。在2000年千年峰会上通过的《千年宣言》对这一纲领予以确认，并号召集中全球力量在2015年实现8个国际社会一致同意、可以进行测量的千年发展目标。这



印度的妇女们在收割水稻

些要实现的目标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关注的12个领域（见13页专栏）联系在一起，二者都关注妇女权利的平等和赋予她们权力的问题。这样做不仅会使妇女受益，还会使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受益。一旦妇女掌握了农业生产知识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力就会提高；对女童进行教育不仅会使育

联合国和妇女：1995—2005年

1995年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于9月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对世界妇女关注的关键领域进行了审议和辩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全球社会发展峰会于当年3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这次会议广泛地讨论了有关妇女的问题，并通过了《哥本哈根宣言》，这一宣言包括在男女之间实现公平和平等的承诺。

1996年 妇女和发展问题第二项全球中期计划规定了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妇女平等方面所做工作的方式，其中包括联合国机构雇用人员的实践、政策和计划等。

1997年 联合国秘书处实现按地理分布配备35%的妇女职务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一位专门负责性别问题妇女权益促进事务的特别顾问。

1998年 联合国秘书长批准一项联合国工作人员探亲假计划，以帮助协调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作及家庭生活；联合国制订一项女性工作人员在机构内部调动的制度，一方面可以增加这些人员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联合国机构更加有效地获得配偶简历或其他有意义的信息。

1999年 有关“为实现性别平等而采取

的特别措施”的联合国行政指令开始在联合国招募、提升和分配女性工作人员时执行。这一指令特别指出，在联合国工作人员招募工作冻结期间，招募女性职员的工作可以例外；任何性别比例没有达到50/50的部门出现的职位空缺，应由女性候选人来填补，但填补的女性候选人的资历必须符合职位要求，其水平应相当于或高于竞争同一职位的男性候选人。

2000年 改善性别平衡的目标被纳入人力资源管理行动计划之内；秘书长要求联合国所有部门和办公室应配合有关特别措施行政指示的执行，各部门经理在改进性别平等

养不良的现象减少,还可以降低死亡率;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妇女的文化程度与减少艾滋病感染率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由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报告《北京背叛者》(Beijing Betrayed)及由联合国妇女权益促进处发表的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专家小组会议的报告向人们展示,如果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与《行动纲领》,那种无视贫困的结构性本质和性别不平等的宏观经济思维就必然受到挑战。军人政府的兴盛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所营造的环境对妇女所享有的人权越来越显示出敌视的态度。自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举行之后,那些受市场驱动的政策,特别是贸易和财政规则方面的变化,以及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及解除规制等,使得贫困现象增加,也加深了国际间和国内的不平等现象,而妇女则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现象导致合法及非法的移民的增加。尽管这股移民潮在世界范围内为妇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机会通常属于那些不规范的市场,所扩大的是非正式经济中的就业,对妇女来讲既不安全、还会受到剥削。

进入新千年后,跨国公司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北京背叛者》强调,联合国这一在世界上最为人们认可的全球性机构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其作用,这是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力量变得日益强大。这种艰难的气候使得许多国家的政府缺少履行它们在北京做出的承诺的政治意愿。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执行董事伊琳·海泽尔2005年3月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9次会议上表示,妇女需要采取行动,她们需要资源,需要政府对她们的人权予以有效的保护和推进。

她认为,在那些最为人们关注的关键性领域,情况更为复杂,但在两性平等和赋权于妇女这一主要领域,问题仍旧是赋予妇女在经济上的权力、提高她们的福利待遇和增加她们参与决策的机会。

欧洲对外政策顾问米娅姆·冯·雷森在她的报告中强调,不实现性别平等,不赋予妇女权力,贫困现象就不可能被消除,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改变传统和文化上的性别标准。政府必须鼓励对工作和家庭责任加以协调。但自1995年以来,妇女的状况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遭,她们的失业率不断增加,所获得的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则越来越少。统计数字显示,在美国,40%的妇女比男人更加容易沦为穷人。在拉丁美洲,妇女的收入只是男性的39%。

由于无法有效地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给国家带来的贫困化冲击,许多国家的政府纷纷将小额信贷作为应对妇女贫困现象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些妇女在那些小额融资计划中无论存钱还是借贷,往往以谨慎而闻名。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并非总如人意。比如,在孟加拉国,妇女所获得的作为对她们经济支持的小额信贷事实上通常被家里的男性成员所使用,并由他们负责还贷。消除贫困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妇女获得土地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而变得更加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性别角色使这些妇女承担着保证家庭之所需的责任。不仅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文化以及政治体制将少数民族和移民妇女贬入低收入、低技能的部门,甚至发达国家也很少为妇女提供能有效调解家庭和工作生活的矛盾的政策。尽管大多数地区都对工作

方面的表现将被作为重要的评估因素。

2001年 对维和行动评估和培训服务已经被制订在“性别与维和行动”一揽子培训任务中;联合国总部鼓励其设在各地的办事处及管理及人事部门负责人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配偶安排就业。

2002年 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将部门经理在为女性求职者提供录用机会方面的表现及在提高女性代表性方面的进展纳入对他们工作表现的评估范围。

2003年 新的目标:各国部门应在2006年之前实现50/50的性别比例;在任命秘书

长时代表或特使方面对妇女的任命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做出承诺,以实现在2015年达到男女各占一半的性别平衡目标;建立应对性骚扰问题的程序。

2004年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8次会议以最新文字形式响应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在联合国系统改善妇女地位”的决议。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将其部门空缺职位的招募通知扩大散发到世界范围的职业妇女协会,并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非洲及阿拉伯地区的驻地办事处和特别机构的一批专家候选人进行接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将录

用职位的资历要求降低至P-3级及以上水平;而且,目前已经引入了一些照顾工作人员家庭的灵活性政策。

2005年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49次会议对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所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议和评估。在2000年6月举行的大会第23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中,会员国一致同意“对北京《行动纲领》的进一步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目的是在2005年使所有团体一起参与对这一进程的评估,并考虑在北京《行动纲领》通过10年之际发起新的行动。”

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新决议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2005年3月举行的第49届会议上对《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领》进行了10年审议和评估。这次会议还通过了10项内容广泛的有关改善妇女地位的决议,其中包括将性别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和计划的主流,任命一名有关歧视妇女、拐卖妇女的特别报告员,在灾难后救援、特别是印度洋地区海啸灾难发生后的救援工作中体现性别视角,土著妇女问题以及妇女经济促进等6项新决议文本。此外,这次会议还通过了4项传统决议:《妇女、女童与艾滋病问题决议》;《关于促进妇女权益国际研究与培训学院(INSTRAW)的决议》;《关于阿富汗妇女及女童状况的决议》以及《巴勒斯坦妇女状况及对她们的援助情况的决议》。

由45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职能机构主要关注在执行北京议程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和面临的挑战。在该机构本署理事会会议初期还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就通过一项宣言达成共识。各国政府在宣言中强调,全面贯彻执行北京文件对于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一致达成的目标十分重要。

委员会在将性别视角融入国家政策和计划的主流的全案决议草案中再次重申,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有效决策的工具,而不是对既定的、与妇女有关的政策和计划的取代。有关歧视妇女的法律方面特别报告员的决议草案敦促各国政府加强对现存法律中有关性别歧视内容的审查,并取消这些法律。

委员会还号召各国政府尽快缔结打击人口拐卖、特别是拐卖妇女和女童的双边、次地区性、地区性和国际间的协议。在适当的时候采用旨在减少对这类人口拐卖的需求的特别措施,以作为对贯彻执行《联合国反对跨国界有组织犯罪公约》及《防止、禁止和惩处拐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妇女和儿童行为议定书》的补充。在土著妇女的权益方面,委员会建议各国政府、政府间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采取措施,以确保土著妇女对《北京行动纲领》及千年发展目标贯彻执行、后续工作及监督工作的参与。

委员会在新通过的有关《在灾后救援、特别是印

度洋海啸灾难过后的救援工作中融入性别视角的决议中敦促各国政府将性别视角融入灾难预防方面,另外一项有关《关于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决议》则敦促会员国消除性别歧视,为妇女和女童接受各层次的教育提供平等的机会,并鼓励她们接受教育。

委员会在其通过的四项有关妇女、女童和艾滋病的传统决议中强调,性别平等及赋予妇女权力是降低女性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关键。委员会指出,提高妇女的地位是扭转这种疾病流行的关键。委员会在另外一项决议草案中对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所(INSTRAW)参加对《北京宣言》、《北京行动纲领》及对2000年全体大会特别会议结论文件的审议和评估工作及对这些工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欢迎。委员会还呼吁各界通过联合国信托基金向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所提供资助,强调这种资助在保证这一机构履行其使命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委员会在其通过的有关《关于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状况的决议草案》中,对阿富汗政府承诺使该国的妇女和女童享受全部人权和基本自由,恢复阿富汗妇女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在教育方面实行男女平等,为妇女提供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机会等承诺表示欢迎。委员会还对阿富汗新宪法的制订、在安全方面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去年10月9日在和平条件下成功进行的总统选举、阿富汗妇女可以参加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及最近有关过渡法律报告的发表等表示欢迎。

不过,并非所有的决议都是以未经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的。由牙买加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提出的《有关巴勒斯坦妇女问题的决议》以38票赞成,1票反对(美国)、2票弃权(加拿大和冰岛)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妇女地位委员会在这项决议中再度确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是巴勒斯坦妇女现状得到改善、实现自力更生及与社会发展规划一体化等方面的主要障碍。决议呼吁采取切实措施,以改善巴勒斯坦妇女及她们的家庭目前在被占领土上的困境和生活状况。

——维克拉姆·苏拉

妇女关注的 12 个关键领域

1. 消除贫困。平等提供能负担得起的住房、土地、自然资源、信贷及其他服务。
2. 教育。到2005年之前消除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性别差距。
3. 健康。加强健康服务，减少孕产妇死亡率。
4. 暴力。采取法律及社会措施防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并消除拐卖妇女现象。
5. 武装冲突。加强妇女对解决武装冲突的参与。
6. 经济不平等。确保待遇平等、薪酬平等；为女性获得资源、就业、市场和贸易等提供平等的机会。
7. 权力分享。在政府机构实现性别比例的平衡，女性能平等加入权力机构。
8. 制度。所有立法、公共政策、计划和项目都应体现性别视角。
9. 人权。鼓励政府批准并促进执行《国际人权公约》。
10. 大众传媒。确保妇女获得信息的自由并消除媒体传统的性别歧视。
11. 环境。允许妇女参加有关环境问题的决策，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方面应该考虑到性别问题。
12. 女童。确保女童享有同男孩一样受教育及健康的权利，使她们能够对自己形象有正确认识。

场所制订了不准歧视妇女的法律，但这些地区并没有为妇女提供那种能满足家庭需要并使她们能够尽责任的政策，如弹性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同工同酬及使妇女融入非传统部门等问题至今仍然有待制定规则。

在妇女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方面，她们的健康是最为关键的问题。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路易斯·阿伯尔的话说，“没有什么比艾滋病的泛滥更能反映出性别歧视带来的那种灾难性、令人震惊的影响。”在过去的10年中，染上艾滋病毒的妇女和女孩迅速增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任德斯蒙·约翰斯警告说，对抗这种迅速蔓延的疾病的一些传统的方法，如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等对妇女根本不起作用。此外，艾兰·戈特马切尔研究所的詹姆斯·纳德表示：“据估计每年有52.9万名妇女在怀孕或分娩期间死亡，98%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改善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状况对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提供服务的主要领域包括避孕、产妇产后保健和对性传播疾病的控制。

1995年以来，国际社会就女童教育及抗击贫困达成共识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目前的形势表明，这方面的努力还应该得到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妇女和性别项目首席协调员桑尼耶·古萨尔·科拉特表示，有数据资料的128个国家中，只有52个国家能够在2005年实现小学和初中教育的男女平等。“性别平等问题在即将举行的有关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中将成为中心议题。”泛美开发银行的马尔科·费罗尼认为，妇女参政的趋势正在上升势头，然而，“尽管两性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已经被缩小，但在教育质量方面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对于那些土著人口来讲，情况更是这样。”尽管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妇女和女童仍旧面临着不平等的对待，在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方面情况更是如此。根据妇女环境与开发组织的调查，妇女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也与辍学、高文盲率及陈旧的性别观念有关。

在确保妇女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信息、鼓励媒体消除那些陈旧的性别观念、鼓励妇女参加培训并获得信息通讯技术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联合国科技发展委员会的索非娅·胡耶尔认为，对于一些妇女来讲，接触新技术十分困难。在谈到促进电子学习对于妇女来讲是跨入信息通讯技术世界的关键时她表示，无论是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抑或是应对隔离文化的一种战略，这一步都是非常重要和正面的尝试。

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绿色地带运动”（见《联合国纪事》2004第4期）创始人旺加里·马塔伊对委员会表示，将和平与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对实现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向和平投资的一种方式就是关注环境，以一种负责

的、可持续的方式管理好我们的资源，并平等地分享这些资源。”她呼吁妇女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努力时，记住这样一个口号，“减少、再用、循环和修复”。199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危地马拉的丽格伯塔·曼珠表示，她家乡的基切—玛雅人斗争了几十年终于获得了包括对土地权利在内的土著民族权利。目前，被拐卖到欧洲的妇女的人数正在不断地增加。不幸的是，这些人缺少保护，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因这些犯罪行为进行斗争方面不愿做出更多的努力。

联合国安理会在2000年通过了第1325号决议，这一决议首次注意到战争给妇女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并呼吁终止对那些在冲突过程中和冲突结束后犯有性侵犯罪行的人们的免罪权。决议要求在建设和平和维和行动中实现性别平等，妇女应该平等参加和平进程过程中不同阶段所有层次的决策。不过，迄今为止只有不多国家的政府在冲突预防中开始将性别视角结合起来加以考虑，而且，女性在对外政策和决策中仍缺乏代表性。为了同《北京宣言》保持一致，大多数国家——联合国成员国中的90%——已经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然而，《北京宣言》报告称，大多数的国家尚没有执行这一公约的具体措施。□

信守承诺
千年发展目标

2015



UNHCR, Beijing

安全 母亲行动

事关人权和社会公正

雷塔·鲁斯拉

母亲安全意味着所有妇女在整个怀孕和分娩过程中所需的卫生保健和安全方面的关心。过去几十年来，妇女问题被“半边天”这一词汇所限制，而另一半关于妇女生活的基本情况仍旧没被完全认识到。妇女和儿童占世界总人口的75%。人口问题对人类生活质量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将减少年度人口出生率（或零增长率）的做法与根据资源情况对人口进行重新布局结合起来。

本文的目的在于理解妇女的生育权以及如何根据社区及社会的规划来对生育作出选择以平衡这种权利。这种选择不仅符合妇女本身的利益，同时也对社会有利。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讲，即使她们受过教育，也被赋予了权力，但实际上由于文化的交叉，她们并不能主宰自己的生育问题；真正起主宰作用的是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所拥有的文化。在这方面，好

消息是社会的变化是永恒的。妇女健康、孕期关怀和计划生育等措施的提供可以确保所有的机会都被完全利用，妇科/产科界所提供的培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监控到的卫生保健统计数字，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 每一天至少有1600名妇女死于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并发症，也就是说，每年最少有58.5万名妇女在怀孕和分娩过程中死亡，这种并发症是导致发展中国家15至49岁年龄段之间妇女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

✎ 每年有5000万妇女经历与怀孕有关的并发症，导致许多妇女长期患病或伤残；

✎ 每年世界上有2亿妇女怀孕，其中1/3即7500万例是意外怀孕；

✎ 每次怀孕都使当事妇女面临风险；其中至少有40%的妇女将在这一过程中经历某些并发症，其中有15%的并发症对生命构成潜在的威胁。

每年全世界有2000万妇女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接受堕胎，后果是导致8万孕产妇死亡，几十万妇女残废。在一些国家，没有安全保障的堕胎是导致许多妇女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但实际上这是最容易预防也最容易治疗的。

如果那些不愿意要更多孩子的妇女都能够停止生育，那么世界人口出生率在拉丁美洲能够平均减少35%（440万），在亚洲能够减少33%（2440万），在非洲能够减少17%（400万）。孕产妇死亡人数将会大为减少，因为那些本应避免的生育通常会导致当事者冒更高的生育风险。

间隔时间不足36个月的分娩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并发甚至死亡的风险。

尽管围产期护理的目标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但这种护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如果在改善妇女地位的同时能够大量增加包括计划生育和转诊服务在内的基本健康护理机构，那么大多数因怀孕和分娩所引起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为了妇女怀孕和分娩的安全并保证她们的健康，产科医师和妇科专家以个人名义或通过国家和社会参与提倡支持和技术援助是必要的。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不可宽恕的孕产妇死亡和伤残率，也是为了确保每位妊娠妇女都能成为健康的母亲，她们所生下的都是健康的婴儿。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所有的婴儿都需要特殊的关注和护理，这样他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然而，在许多国家一些生产后的母亲和她们刚刚出生的婴儿却要面临许多不公平。

确保妇女孕期和分娩安全的主要方面包括：社区教育，包括提高孕产妇营养在内的产前护理和咨询，分娩时有熟练医护人员助产，包括急诊在内的妇科并发症的护理，产后护理，堕胎并发症的处理，堕胎后的护理及在法律禁止堕胎的地方提供终止妊娠的安全服务措施；计划生育方面的咨询信息及服务；生殖健康教育和为青春期的人们提供服务。

任何对妇女进行过护理的人员都清楚，如果她本人身体有病，那做母亲（或父亲）时就会出现焦虑、压抑、情绪低落等情况，有时甚至难以劝慰。那些了解怀孕和分娩给妇女在心理、思想、生活和福利上带来真正影响的人都能够完全理解这一重要的联系。对使妇女能够得到关怀并改进关怀的质量做出强有力的承诺，是伙伴关系的首要任务，而这种伙伴关系正是为了增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妇女和儿童健康目标的政治意愿。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观点看，减少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变得越来越重要（见<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为沟通交流和协作而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可以对安全母亲计划起到加强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在非洲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包括高生育率、避孕措施很少被使用、性活动早龄化及早婚现象等。全世界每年有58.5万名孕产妇死亡，而所有这一切是造成其中一半人死亡的原因。这种死亡发生在只占全球13%的人口，却占了全球23.5%的出生率的非洲。赋予个人、家庭和社会以权力是我们前进的努力方向。

然而，忽视自己的健康是妇女，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妇女生活中的现实。由于照顾孩子、家人和家庭的负担以及对食品的生产 and 食物的准备所承担的责任，种种的原因使得改善她们健康状况的机会实际上十分有限。此外，她们的健康还因她们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恶化，她们缺少自己的组织，也没有能力对有关方面施加政治压力。应该赋予这些妇女权力，使她们能够讲出她们对健康的需求和关注，要求得到可信赖的、不拖延的、要求服务提供者承担起他们的责任，要求政府制订有关她们的政策，更加全面地参与到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来。

安全母亲运动发起于1987年，目标是减少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母亲们的死亡率。从那时起，人们了解了许多拯救怀孕和分娩妇女生命的方法及母亲与新生儿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妇科/产科界能够采取的最具有帮助意义的行动，是在妇女组织、卫生部及其他相关合作伙伴的配合下为人们提供妇女健康方面的教育培训。国家妇产科界应该根据孕产妇健康和围产期保健的状况，对包括孕产妇健康和卫生护理等内容在内的一些简单的信息加以甄别。总的来讲，自我护理和社区关怀等应该是这些信息的主要内容。

相对来讲，目前的医学课程在帮助卫生保健提供者进一步理解为何要将妇女一生的健康状况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向她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更加能够为人们理解的关怀方面做得非常失败。从妇女的观点看，讨论并关注她们在健康方面的需求应该成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培训的固定内容。每个国家的妇科/产科界应当参与监督本国为妇女提供的卫生保健的质量，鼓励并鞭策有关部门从事与实现安全母亲目标有关的研究，对这类研究应给以物质方面的支持。在孕产妇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更要这样做。我们应该放眼全球，着力于本国，发起一场全民运动，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国家妇科/产科界应该致力于继续教育工作，不仅包括自己的专业和技术，还应包括孕产妇健康和计划生育关怀的提供者，特别是在最初的转诊层次上；

如果国家妇产科界能根据自己国家制订的目标来提供培训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应用于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和扩大

教育与艾滋病 知识是否跟得上变化？

计划生育服务的提供范围方面，那么改进医学课程的努力就会更为成功：

✎ 就妇女的总体健康状况和与合作者的合作而言，应当尽量将培训的类型阐述清楚，这对于培训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十分重要：是培养产科医生，还是培养传统的助产士，抑或是接生婆；

✎ 运作研究——有时被称为健康体系或“行动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国家妇产科学界可以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安全母亲行动的运作研究主要包括对孕产妇卫生保健、特别是对预防方面的创新进行评估并予以改进；

✎ 对教育运动的评估。

孕产妇健康是一个包括社会、心理及文化根源在内多层面的问题。对此，没有简单或单一的解决方法，而且，我们必须从多层次、多部门的角度来应对妇女的卫生保健问题，拟订一些高效的项目和计划。通过这几十年来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消除并减少与分娩有关的风险及不确定因素的知识。随着在这方面的动机和政治意愿的不断加强，获取更多相关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做个安全母亲是妇女们应该享受的权利。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妇女能够平等享受她们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健康服务。“健康为人人”。应鼓励开展以事实为根据、主要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上可承受的、可以对计划和当地的合作者立即产生影响的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是在获得紧急救护和计划生育服务方面，社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之，人人享有自由，人人也应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尊严。□

（请参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关于千年“”的报告《更大的自由：为人人享有人权、安全和发展而奋斗》。网址：<http://www.un.org/largerfreedom>。）



雷塔·鲁斯拉，医学博士，妇女健康和教育中心主席。网上杂志《妇女健康版，COM》总编。该杂志主要关注世界妇女的福利和卫生保健。从1988年起她还担任美国妇产科学院的研究员，并同UNA-USA、和平团、世界卫生组织等不同的国际性机构一起合作。鲁斯拉博士主要关注的领域为世界卫生保健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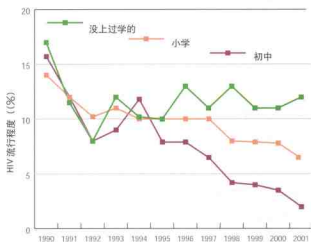
学校系统是可以用来应对艾滋病的有力的交流手段，在很多国家得到的证据显示，教育与同这种疾病有关的习惯方面的改变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那些高危人群因认识到所包含的风险，并根据所获得的有关艾滋病传染源方面的明确信息，做出明智的决定。同样，通过学校来传播那些有效预防这种疾病的办法，可以加强这种有益的效果。

对肯尼亚、马拉维、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六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艾滋病都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认识，但每个国家的人们获得这些相关知识的渠道却大不相同。在乌干达，相关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所组成的社会网，但其他国家的人们则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和学校、教堂及诊所等机构来获得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乌干达人声称知道某人染上艾滋病这种事实，在促进人们行为产生变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国家是艾滋病教育、增进大众知识及避免危险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联系的典型范例，而且这种联系还在增加。如下图显示的那样，HIV在乌干达乡村蔓延的比率在最初阶段同其总体教育水平几乎相同，但从1995年开始，那些拥有初中教育水平人群中发病率要明显低于受教育较少的人群。

在南非进行的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在15—24岁年龄段的人群中，有1/3的人了解到更多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其中，大多数的相关知识是从学校获得的。

——萨吉内·达马斯

乌干达乡村 HIV 流行程度，按教育类型划分，
1990—2001 年
(18—29 岁年龄段的个人)



注：其中小学教育为上过小学几年级或完成整个1-7年级的教育，初中教育为上过几级初中或完成整个8-13年级及其以上的教育。
资料来源：德韦尔克（2004）。